

编者按

从一座书院,读懂一座城的精神底色。本报和“闽南智慧”编辑部、“泉州发布”编辑部联合推出“泉州书院”系列文章,和您一起穿越时光,探寻“闽学”的厚重历史,呈上一份鲜活的文化指南。

閩人智慧·在泉州

“泉州书院”系列

提起南宋泉州的文化“顶流”,那会是谁?答案无疑是——朱熹。说到朱熹与泉州,书院则是绕不过的话题。800多年前,朱熹曾盛赞泉州:“此地古称佛国,满街都是圣人。”他的足迹遍布泉州的山山水水,把严谨思辨的理学思想、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播撒在闽南大地,也让泉州书院从零星的书斋走向规模化的文教体系,筑起刺桐城千年文脉的精神根基。□融媒体记者 魏婧琳 庄建平 通讯员 林海吟

朱熹初染的“讲学圈”

在朱熹到来之前,泉州虽已有欧阳詹开“闽人知学”之先河,却仍缺少系统的理学传承与规模化的讲学场所。唐时的“四门学”、五代的“招贤院”,多为官方办学或私人授徒,尚未形成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气。直到朱熹的到来,才真正点燃了泉州书院的文化火种。

南宋绍兴二十六年(1156),朱熹在泉州城西北游历传道之余,见一处“小山屹然,丛竹如林”,顿生钟爱之情,挥笔题下“小山丛竹”四字匾额,在此结庐讲学。如今,在书院旧址处尚有小山丛竹坊一座,坊额“小山丛竹”据传为朱熹手书。

朱熹讲学,不拘泥于当时官学“死记硬背、循规蹈矩”的旧法,而主张“格物致知、知行合一”。他既带领学子诵读“四书五经”,又引导他们观察自然、体悟世事。这就好比一位顶级“知识大咖”,不满足于在官方大学教习,偏要跑到地方学校做直播,硬生生把“理学”这门“高冷”的学问,变成了闽南百姓听得懂的“生活指南”。

九日山书院素有“古早自习室”之称。相传唐代欧阳詹曾在此读书,后朱熹来此讲学,与当地士人切磋问难。在九日山书院讲学时,朱熹常携学生登山临水,于林泉之间辨析义理。南安名士傅自得、永春名儒陈

知柔皆与他交游甚密,或“谈经论义,篇什间作,昼夜不休”,或“相与追游莲花、九日、凉峰、凤凰、云台之间,昼则联车,夜则对榻”。这种深入浅出的讲学方式,使理学不再高悬于庙堂,而是变得鲜活可感,吸引了泉州及周边州县的学子锁定稀缺的“名家开讲”,小小书院常常座无虚席。

朱熹在泉期间,可谓“凭借一己之力”直接推动了当时泉州书院的兴盛,十多所书院几乎都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

九日山书院、小山丛竹书院为朱熹亲自创建或讲学之地;石井书院、杨林书院则留下他讲学的足迹;文公书院更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而建,杨林书院位于南安石井杨子山麓,朱熹曾多次至此讲学,四方学士来访求教者络绎不绝,杨子山上至今留存“活源”“仙苑”“极高明”等朱熹题刻。石井书院(今安海)则见证了“二朱过化”的佳话——朱熹之父朱松曾任安海镇官,公余“择民之秀者,充弟子员,教以义理之学”;二十余年后,朱熹任职同安,常往来泉、同之间,必经安海,寻访父亲遗迹,“见其老幼义理详悉,遂与论说”,士人因此愈加勤学。泉州孔庙明伦堂旧有一联云:“圣域津梁,理学渊源开石井;海滨邹鲁,诗书弦诵遍桐城。”所言正是这段渊源。

普惠大众的“教育网”

那么,朱熹当年办书院的初心是什么?

他在同安主簿任上,虽泉州及所属各县均设有官学,但这些官学招收生员名额有限,远不能满足士子求学之需。更令他忧心的是,官学日益沦为科举附庸,“忘本逐末,怀利去义”“无德行道艺之实”,学子读书只为“钓声名,取利禄”。他在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中尖锐批评官学已成“声利之场”,“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”。在朱熹心里,“穷理之要必在读书”。

正是有感于此,朱熹选择以书院为阵地,将教育从官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他通过创办书院、公开讲学,在泉州织就一张“接地气”的教育网络,使更多普通士子得以接触理学,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和学术的普及,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水平。

朱熹在泉州通过收徒讲学,不断总结教育经验,掀起了一股倡学之风。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南宋时期泉州书院的兴盛,也为朱子学在闽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。

“接地气”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的增多,还体现在“教育面前人人平等”。据记载,当时的书院秉持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,无论出身名门还是普通家庭,甚至是侨居当地的番商后代,只要有志于学,都能入学听讲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满足不了士子就学需求的不足。

更可贵的,是讲学方式的开放。朱熹在书院讲学,不照本宣科,不求学生死记硬背,而是鼓励提问、辩论、交流不同见解。这种宽松而真诚的学术氛围,使泉州逐渐成为闽南理学传播的核心区域。自南宋至明清,泉州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石井书院、欧阳书院、正音书院、龙山书院等数十座著名书院先后建成,遍布城乡。这些书院虽风格各异,却都传承了“兼容并蓄”的教育理念。

清代进士陈科捷曾言:“吾泉务实学,自欧阳四门以后,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,渊源所渐,浸与伊洛比盛。”此语道出了朱熹对泉州教育的深远影响——在朱熹的推动下,宋代泉州的教育已与中原地区相提并论。



南安石井杨林书院里,儿童现场吟诵国学经典。(本报资料图)

南宋“大咖”凭一己之力
“盘活”泉州书院



欧阳书院(本报资料图)



温陵书院原为泉山书院,正德十年(1515),书院移建于泉州家巷(现东门小学)。(施燕莎 摄)

朱熹曾在石井书院讲学(吕吉鸿 摄)



小山丛竹书院朱熹手书石牌坊(肖培滨 摄)



▲朱熹自画像(洪旭 摄)

兼容并蓄的“闽南风”

《泉州府志》载,朱熹过化之后,泉州“民风更变”,民间婚丧喜庆悉“遵朱子家礼”。《同安县志》亦载,同安经朱熹“教化”后,“礼义风行,习俗淳厚。去数百年,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。”朱熹的讲学意义,不止于教育本身,更在于塑造闽南文化的精神特质。

朱熹带来的理学思想,并非生硬的理论灌输,而是与闽南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。泉州自古为港口城市,市舶繁盛,番商云集。朱熹对此并未一味排斥,而是提出“以义制利、义利兼顾”的观点,反对唯利是图,亦认可“通商惠工,皆王者之政”。他在同安任上,曾撰《申严婚礼状》,针对当地商贾之家在婚丧礼仪上奢靡逾礼的风气加以引导,为泉州

“亦儒亦商”的社会风尚提供了思想上的调和。同时,他在书院讲学中常引日常生活事例阐明义理,使理学从士人的书斋走向市井巷陌。可以说,这种以义制利、以礼化俗的思路,恰好契合了闽南人“重商而不弃儒、逐利而不忘义”的生活状态,让理学在守正创新中融入当地生活。

不同于古代官学的刻板拘束,泉州书院从一开始就走“开放路线”。无论是治学观点、思想流派,还是不同地域的文化交融,都能在这里被接纳、被讨论。书院之中,士子与番商之后同席论学,程朱理学与本土风俗互有吸纳,既有理学的温润厚重,又有海洋的开放包容;既有儒家礼义的持守,又有商贸智慧的灵动,渐

渐形成了闽南文化独一份的精神气质。

站在小山丛竹书院的匾额下,望着眼前葱郁的竹林与古朴的建筑,我们仿佛看见朱熹当年讲学的身影,听见学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与激烈的论辩声。1935年,弘一大师曾补题“过化亭”匾额,并记曰:“泉州素称海滨邹鲁,朱文公曾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……余昔在俗,潜心理学,独尊程朱,今来温陵,补题‘过化’,何莫非胜缘耶?”

这份“朱墨染泉山”的文化积淀,这份“讲学润千年”的教化传承,使泉州书院成为闽南文化的精神地标之一。那份“重教、敢拼、务实”的基因,深深融入闽南人的血脉,指引着后人在传承中创新,持续推动千年世遗文脉生生不息。